

读书札记

用故事阐述生活中的经济学

读《王二经济学故事》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陈岚桦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生活重心日益向经济领域转移,经济学也成为一门显学。《王二的经济学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7月),以买火车票,卖粮,买地,盖房子,装修,记账,打工等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把本来深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读者,是一本高质量的经济类普及读物。

其实,小到超市购物、大到买房置业,我们每天都在做出经济决策。从降息、提升准备金,民众无时无刻都在感觉到个人生活受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在《王二的经济学故事》书中,王二是有着佃农、打工仔、白领、老板不同身份虚构的人物,透过王二时而平淡、时而离奇的故事,作者把重大的经济问题信手拈来,把本来深奥枯燥的经济学原理活灵活现地呈现给普通读者。有助于读者增加经济常识帮助个人决策。

例如,对于眼下热议的欧洲债务危机,特别是西班牙和希腊遇到的经济难题,民众多数不知其所以然。在书中王二减肥与欧洲债务危机的故事里,作者用一个爱吃垃圾食品、不好运动、喜看肥皂电视剧的胖子王二就解释得活灵活现。如果将患了债务病的希腊比作胖子王二,那么以法国、德国为主体的欧盟就是其父母。父母知道逐日贪吃不好动的王二患了“三高”症状(这恰如希腊加入欧盟后的提升工资、提高福利和增加政府支出),需要运动、忌口来减肥(如同降低公司、福利和政府支出),但王二积习已久,刚运动两天劲劲又上来了,父母(恰如以欧盟为代表的德、法)溺爱,忍不住又让王二开始吃垃圾食品,看电视,如此王二更胖,更贪吃、运动更少,不得已,父母就增加开支供应王二(恰如欧盟给希腊贷款)。作者用一个普通减肥失败的故事探讨了希腊在债务危机中暴露出需要进行改革问题。令人很容易理解且过目不忘。同时也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

还有,对于近年来热门的汇率问题,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作者将王二比作一个卖酒的,在卖酒中阐述汇率问题。在王二兑酒的故事里,王二是卖酒的,和他的竞争对手李四的兑酒方法略有不同。王二的方法是往水里兑酒,一桶水里兑上半桶酒,酒的味道也不错;李四的方法则是往酒里兑水,但加水没有定数,到口感合适为止。市场好的时候,两家相安无事,市场差的时候,两家就为谁造假更多吵得不可开交。可是,村里其他人都知道,两家都往酒里掺了水,半斤八两而已。作者郭凯告诉我们,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就是王二的兑酒法,而美国的所谓浮动汇率,就是李四的兑酒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对普通人来说,汇率形成机制高深莫测,作者用王二和李四的兑酒法把它说清楚了。

从书中对春运火车票的分析,令读者弄懂了春运问题并不是“用价格机制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这么简单。春运的问题实际上是“有限的火车运力如何在人群中分配的问题”。春节到了,每个离家的人都想回家,对火车票的需求因此极其缺乏弹性;而另一方面,火车的运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怎么涨价、设计何种方案,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总是有人无法回家。而这些被挤出的人可能不是随机分布的,作者用王二的简单故事,道出了围绕着火车票该不该涨价的各种争论的本质问题。

郭凯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他在后记中说,每个人都可以从书中看到属于自己的“王二”,他是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真实人物。他有着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他又遇到了他的先辈们不曾遇到的新问题,比如春节买火车票、子女教育甚至买房梦。当传统智慧遭遇了当代的新问题,王二的困境不仅衍生了王二焦虑,也返照了当下每个人的心灵困境和理智上的焦虑。因此,从焦虑到分析,从分析回归常识,这正是一个常识传播者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封面

刘震云近影



“原来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男的,有人说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刘震云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出版后,即着笔书写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

2011年,刘震云凭借《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此番出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在事儿上没延续,但理儿上有延续。

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更难

海南周刊:您的这部小说的书名很吸引人,书名为什么叫《我不是潘金莲》,有什么寓意吗?

刘震云:我有一些朋友不太同意这个书名。其实《我不是潘金莲》,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一万句顶一句》,这句的反过来源于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姊妹篇也不准确,应该是兄妹篇。

《一句顶一万句》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但把这句话出去是非常的困难,困难并不是说这句话我说不出来,而是我找不到听我这个人的人。《我不是潘金莲》是说,只因为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结果发现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比想纠正一句话更困难。原来我的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的,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我做不到,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这次主人公第一次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用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这句话,就是这个书名《我不是潘金莲》。但她用了一辈子的工夫,从她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是一个家庭离婚案,但最后闹成了国家大事。

海南周刊:您写一部小说大概要多长时间,这些灵感或者是素材来源于哪里呢?

刘震云:写的话很快,半年时间就差不多,但是准备思考酝酿的时间要三到五年。写一部作品可能是很偶然的,看到一个细节、一种景象,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些事情,看似简单但它背后的道理概括的不是一件事,是方方面面的事情,生活的逻辑很重要,生活的逻辑导致了政治逻辑。

《我不是潘金莲》并不是看到一个女的,看到小说中的事情,可能是看到人物和事情背后的东西。这往往是生活逻辑。这本书写的是一种生活逻辑,为什么一件事会导致另一件事,一开始发生的事和最后变成的第十个事不是一件事,相互纠缠在一起,起承转合,不是因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会是另一种因果导致了第一件事的因果发生了变化。

这不是一本女性小说

海南周刊:小说写了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因为一件看起来荒谬的事情而上访的故事,您怎么定位这部小说呢,它是政治小说吗?

刘震云: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米兰·昆德拉写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小说,他很不高兴,说这是一本爱情小说,纠正了一百回。米兰·昆德拉要纠正这不是一本政治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话说的是幽默底线,生活本身很幽默,整个事情的发展变化已经很幽默,幽默的底线和喜剧的底线,比生活中发生的荒诞的底线,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料的。喜剧很幽默的话就是悲剧的底线。

小说中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

倒了从下到上一溜贪官。这种序言和正文的颠倒的本身也符合生活的逻辑,也是一种幽默感。

生活的逻辑会导致政治的逻辑。生活逻辑不但打在李雪莲身上,也打在了与她告状有关的各级官员身上。官员没有一个是坏人,离婚和各级政府全没关系,但导致官员全部落马。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小说没有为民呐喊,官员在第二章都怕李雪莲,反过来找她,第三章写史为民,这更是一个逻辑反转。

“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

海南周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评论说您的作品比较“绕”。现在从《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新书《我不是潘金莲》开始,文风又有了一些改变。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刘震云:我也经常听到评论说我绕,读我的作品绕,我也发现了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为什么这么绕呢?确实它是由来由的。这是一个民族的思维带过来的,特别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你要说清一件事,必须说清八件事。一件事里有八个道理,八八六十四个道理,这说起来的话就特别的费劲。不把六十四个管道给钻出来,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人的话,我们的思考习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说这事说不清楚。那么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我来把它说清楚。当我想把它说清楚的时候,所有人又说“绕”。

事不绕,但事后的生活逻辑是绕的。为什么是绕的?因为别的民族就产生过绕的人,国外有人来钻这64个管道,但中国没有人来钻。我就来钻吧,我就来绕吧。

在生活中,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是我们村的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就是把复杂的事变简单,这事弄还是不弄,要不就弄要不就不弄。但是你看越往上走,一个弄和不弄就变得特别复杂,一层一层为什么要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变得那么的复杂。我们人活在世上有那么复杂吗?需要这么复杂和叠床架屋,这么多管理我们的人设计出来的这么多的东西吗?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和不绕的一个道理。我对自己满意的一点的是,我现在能做到听不同的意见,我的生活突然变得更加的愉快。什么叫愉快?就是两个字:明白。我们把一个事想明白的时候,我们突然豁然开朗,我们是愉快的。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对身边的每一个事,要想明白。

海南周刊:这部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一共三章,前两部分都是序言,只有最后寥寥十几页才是正文。为什么会这么处理?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公路小说,杨百顺、牛爱国都在行走,行走时他们的思考没有停止。有些小说是作者在思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思考。《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公路小说,李雪莲也一直在思考。告状还是不告?本来不想告了,被告的人又逼着她去告。史为民也是行走的思考者。他利用了前面200多页积累的生活逻辑。小说改了结尾,就一下子从21个管道疏通了64个管道。

《我不是潘金莲》最后把一切逻辑都摒弃了,所有能遵守的规律、法律、规则都摒弃了,史为民比我想的还要深,不用纠正,你相信它才会想去纠正它。不用相信,不用纠正,要摒弃。李雪莲还信,史为民是被李雪莲告倒的人,他不信。李雪莲用一辈子没想清的道理,到史为民这里想清了。

《我不是潘金莲》封面



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作家访谈

刘震云谈新作《我不是潘金莲》